

大饥荒的来龙去脉（一）：从大跃进庐山会议

笔记本： 毛泽东

创建时间： 2022/4/2 1:13

更新时间： 2022/4/5 15:01

作者： 176mapbr405

URL: <http://cpc.people.com.cn/GB/85037/85041/7476890.html>

百度百科的“三年自然灾害”现在已经变成“三年困难时期”，看来目前的政治环境已经给了我们一些还原历史真相的可能了。

一、当时我国的中央权力领导体制

这个问题在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上的一篇[《文革前“一线二线”制度是如何形成的》](#)的文章中能得到基本的答案，结合其它的一些资料，简述一下关键的信息。

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苏联高层斗争出现重大政治转折与高层斗争。为了从中吸取教训，毛泽东在下半年提出中央领导人分一线二线的设想。即毛泽东处于二线，其它领导人处于领导一线。

1956年9月中共八大上，落实了这一设想。“八大”选出极为中央副主席，确立中央书记处总书记的领导职务。刘少奇当选**第一副主席**，邓小平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和政治局常委。刘、邓开始全面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除此之外，八大上毛泽东还提到“我老了，不能唱主角了，只能跑龙套，唱戏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到了1959年4月的全国二次人大上，刘少奇正式当选为**国家主席**。

此外，1957年毛泽东访苏时，据当时担任翻译的李越然回忆，毛泽东与赫鲁晓夫提到过接班人的问题，毛泽东明确提到“第一个是刘少奇，第二个是邓小平。”

虽然无法查阅到党内的一些保密资料，但是“一二线领导机制”其实有更为直接的证据，那就是在《刘少奇年谱》与《邓小平年谱》中可以明确看到，二人在这一时期已经在具体处理国家的日常事务；这一时期的《人民日报》等报纸上二人的相关报道上可以确认这一点。

综上可以认定，至少自56年9月起，毛泽东就是将刘少奇、邓小平作为国家未来的领导人进行培养，并且刘、邓的接班人顺序在党内达成了共识，开始负责具体的国家事务。

二、“三年困难时期”的历史脉络

在百度百科的描述里，这段时期的困境是因为“从1959年至1961年期间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严重“左”倾错误，加上从1959年到1961年，中国农田连续几年遭受大面积自然灾害所导致的全国性的粮食和副食品短缺危机”。总结来说就是“人祸”+“天灾”。

人祸我们先不谈，先考证“天灾”是否存在。据考证国内资料，59年发生了的确发生了严重的旱灾。

据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刘颖秋主编的《干旱灾害对我国社会经济影响研究》所载，“1959年是新中国成立10年来旱情最重的年份”，1959年，江、淮出现历史同期（记载）的最低水位。江苏省山区塘堰、小水库干涸37万座（占本省同类型工程的67%）。湖北省塘堰干涸达80%，8月中旬以后小河几乎全干；由于江水奇低，沿长江的121个水闸和161个明口，能够自流放水的也只有50个闸、13个明口。湖南省邵阳、衡阳和湘西州的71万处塘坝，在9月中旬有半数干涸。据国家统计局、民政部编撰的《1949-1995中国灾情报告》记载，1959年全国出现了“受灾范围之大，在1950年代是前所未有的严重自然灾害，”受灾面积达4463万公顷，且集中在主要产粮区河南、山东、四川、安徽、湖北、湖南、黑龙江等省区。1960年，灾情继续扩大，北方持续爆发特大旱灾。进入1961年后，大旱蔓延黄河、淮河和整个长江流域，河北、山东、河南三个主要产粮区的小麦比上一年最低水平又减产50%。

但是诡异的是，另外一些数据提供了相反的结论。

据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的研究员，已退休的高素华女士著《[中国农业气候资源及主要农作物产量变化图集](#)》（气象出版社，1995年4月第1版，第50页）所查，1960年确实为一个旱年（负距平），但其干旱幅度与1955、1963、1965-1967等年份比，并非特别突出。而在新华社高级记者，中国新闻学院教授杨继绳《六十年代大纪实》中也提到当面请教高女士的结果：“1958年到1961年，在全国范围内没有出现大面积的旱灾和涝灾，也没有出现大面积的低温灾害。这三年是正常年景。”杨继绳还提到，在49、50、52、53、54、55、56、57、58年都有省份或多或少遇到天灾，但“问题在于，这三年的自然灾害是不是比历年的自然灾害更加严重，即使严重一些，是不是能造成千万人死亡，这就需要将这三年的自然灾害情况与历年的自然灾害情况作一个比较。”

需要注意的是，这期间的确有天灾发生，毛主席还就灾情问题做了指示。

国外的气象数据不太熟，回头我搞明白了查询下。

三、邓小平的行止

1958年10月8日的《人民日报》，当天的头版登载了天津专区蓟县亩产11万斤的稻田。这一点还可以从《邓小平年谱》中得到证实。甚至有邓小平在天津接见亩产十一万斤先进代表的照片：



(戴帽子的是河北省第一书记林铁，旁边的光头是刘澜涛，C位黑衣为邓小平，身后白衬衣为杨尚昆)

此外，据《人民日报》1958年10月22日《坚决执行农业生产“宪法” 永吉县拔掉思想白旗，深耕运动出现高潮》一文所载：

“依据邓小平同志的指示……就深耕问题开展了两条道路的斗争，拔掉了白旗，插上了红旗，全县出现了深耕高潮……邓小平同志到吉林永吉县视察时，对这个县明年农业生产作了指示，要求每人平均要达到三千斤粮食，收入三百元钱……东北三省今年农业生产都比过去大大前进了一步……但和关内各省农业增产一倍甚至几倍以上的情况相比，还没有彻底翻身……作为农业生产方针重大革命性的措施，黑龙江省明年耕地面积要比今年要缩减六分之一，即减少播种面积一千六百多万亩，变广种薄收为精耕细作”

这很难不让我们联系到一些熟悉的词语：“政治挂帅”、“高指标”、“瞎指挥”。尤其是在当时反右倾的背景下，基层官员压力之下的瞎指挥现象得到进一步加剧。当然这个其实很容易理解，因为邓小平同志在农业生产上完全没有什么经验。

四：刘少奇的行止

同邓小平一样，刘少奇也没有过农业方面的经验。从如今公开的各种资料来看，刘少奇是“共产风”的主要鼓吹者。

1958年7月5日，刘少奇在北京的石景山发电场讲话时提到：

“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二年三年就行了。明年后年要超过英国，这不是假的。十五年超过美国的问题，其实也用不了十五年，七、八年就行了。大家干劲这么大嘛！不计上下班，干完就算数，有这么股劲，我看七、八年就行。” “中国进入共产主义，不要多久，你们大多数人都可以看到共产主义”。

1958年6月14日，刘少奇在《同全国妇联党组织谈话》时提到：

“妇女的解放，包括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要摆脱家务就要普遍创建公共食堂。” “河南有一个农业社，有500多户人家，其中200多户搞公共食堂.....组织起来后，，出工人数增加了三分之一，从前200多人做饭，办起食堂后，只需要40多人做饭，而且还吃得饱些好些，还节省了粮食。”

1958年7月7日、8日，刘少奇视察河北武清、香河两县和天津市。据时任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刘子厚的回忆：

“总的精神，就是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加速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问题。”

1958年7月19日，刘少奇在天津视察时提出：

在并社时，‘一乡一社’、‘政社合一’。”他说：“一个乡一个社，将来是否叫社，农庄也包括不了，因为有工业、有学校、有商业、又有民兵，生孩子也有人管，实际上是共产主义的基层结构，这是组织起来的公社，有工业、有农业、有学校，生老病死都在这里，这是共产主义公社。”

《光明日报》1958年8月4日报道，刘少奇在山东寿张县视察期间，面对台前亩产将达3万~5万斤的玉米，3万~5万斤的谷子，30万斤地瓜和宏伟社亩产15000斤籽棉的丰产时，大家赞扬：

“你们压倒科学家，他们没敢想的，你们做到了，这是个革命。”

《人民日报》1958年9月30日报道，刘少奇在视察江苏常熟县时，听到亩产万斤时，说：

“一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

刘少奇和邓小平审定的，1958年9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的《高举人民公社的五星红旗前进》社论，是鼓吹跑步进入社会主义的直接证据。社论鼓吹一般的人民公社实现由集体所有制转向全民所有制时，经过三、四年或者五、六年就行了。社论的要求实际上是8月29日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关于在农村创建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但却删去了毛泽东加上的“或者更长一些时间”。

1958年9月24日人民日报报道，在《少奇同志在河南视察时具体阐述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几个条件》里提出：

“有条件的可以立即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条件还不成熟的最慢不能超过三、四年或者五、六年。” “实行消灭家庭，搞男女老少分别编班，分开做事，分开居住。”

此类指示、报道较多，不再列举，**这里提一个比较特殊的具有争议性的河北徐水县的问题。**

河北徐水县历史上是个穷县，1957年亩产量才200斤。农业合作化之后，县委领导全县人民在农忙的淡季大兴水利建设，对劳动力实行统一组织，办起了公共食堂、幼儿园、敬老院、缝纫厂，使家务劳动集体化和社会化。

1958年2月分管农业的书记谭震林听了时任徐水第一书记张国忠的汇报后，到徐水考察并肯定了这种做法。毛泽东在阅读到相关报告时觉得很好，批示：“徐水县的经验普遍推广”。

1958年8月4日，毛泽东到徐水视察，看到庄稼长势喜人，听说小麦获得754斤的大丰收，赞扬了徐水的工作，对组织、军事化管理大为赞赏。但毛泽东从来没有讲关于共产主义的只言片语——尽管后来毛泽东对徐水的赞扬后来经常被指责是支持共产主义。

这里的转折点发生在8月6日，陈正人来到徐水，传达了刘少奇同志指示在徐水搞试点，搞共产主义，搞攻、农、学、兵、商一体等。还有一些具体的指示，如在徐水办两座大工厂，全县可搞一个大联社。

有了刘少奇这位一线最高领导的指示，中央、省委、地委和市委组织了百多人参与指定像共产主义过渡的规划，即8月22日的《关于加速社会以建设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规划草案》，目标是：

“1959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并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到1963年进入伟大的共产主义社会。”

并随之颁布了《中共徐水县委关于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的试点草案》，提出了供给制基础上的些一些具体目标，基本涵盖了衣食住行和生产的二个方面，这里不再详述。但这种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试点在两个月后就因为面临物资供应和资金短缺而草草收场。

毛泽东对徐水的实验保持着谨慎。1958年9月，毛泽东派人去徐水进行了半个月的实地调查，徐水县普遍存在的“共产风”和强迫命令问题引起毛泽东的担心。10月15日至17日，毛泽东在天津听取了徐水、安国、唐县的工作汇报后，对徐水提出了批评。虽然毛泽东顾及接班人的体面没有彻底否定和取消徐水的实验，但这个严重脱离历史发展阶段的实验最终不了了之。

五、毛泽东的行止

毛泽东尽管名义上退居二线，但依然是作为具有最高威望的国家领导人，一些重要事项很多同志还是会给他写信，此外，通过内参等各种消息渠道、也敏锐的察觉到了一些问题。

因此，从1958年10月到1959年4月，毛泽东召开了数次会议，来给浮夸风、共产风降温。

1958年11月9日，毛泽东在郑州召开部分中央领导人与地方负责人的工作会议，发表了《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的讲话，批评了产量造假、过度公社化、跑步进入社会主义的现象：

“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不要把别人的猪报成自己的，不要把三百斤麦子报成四百斤。今年的九千亿斤粮食，最多是七千四百亿斤，把七千四百亿斤当数，其余一千六百亿斤当作谎报，比较妥当。人民是骗不了的。过去的战报，谎报战绩只能欺骗人民，欺骗不了敌人，敌人看了好笑。有真必有假，真真假假搞不清。偃师县原想瞒产，以多报少，也有的以少报多。《人民日报》最好要冷静一点。要把解决工作方法问题，当成重点，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实事求是。” “有些同志急于要宣布人民公社是全民所有，废除商业，实行产品调拨，这就是剥夺农民，只会使台湾高兴。” “河南提出四年过渡到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太多’了，不要急于在四年搞成。不要以为四年之后河南的农民就会同郑州的工人一样，这是不可能的。我们搞革命战争用了二十二年，曾经耐心地等得民主革命的胜利。搞社会主义没有耐心怎么行？没有耐心是不行的。”

1958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武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与会者有部分中央领导人与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上的发言中痛批了造假风、浮夸风：

“报告中提出的一些指标根据不充分，只讲可能，没有讲根据，各部需要补充根据。比如，讲十年达到四亿吨钢是可能的，为什么是可能的，就说得不充分。要搞得更扎实些。” “郑州会议提出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3]初稿，现在要搞成指示，作假问题要专搞一条，不要同工作方法写在一起，否则人家不注意。现在横竖要放‘卫星’，争名誉，就造假。有一个公社，自己只有一百头猪，为了应付参观，借来了二百头大猪，参观后又送回去。有一百头就是一百头，没有就是没有，搞假干什么？” “建议跟县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切实谈一下，要老老实实，不要作假。本来不行，就让人家骂，脸上无光，也不要紧。不要去争虚荣。比如扫盲，说什么半年、一年扫光，我就不太相信，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扫除了就不错。” “绿化，年年化，年年没有化，越化越见不到树。说消灭了四害，是‘四无’村，实际上是‘四有’村。上面规定的任务，他总说完成了，没有完成就造假。现在的严重问题是，不仅下面作假，而且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级相信，这就危险。” “比如一千一百万吨钢，你说一万吨也没有，那当然不对了，但是真有那么多种吗？又比如粮食，究竟有多少，去年三千七百亿斤，今年先说九千亿斤，后来又压到七千五百亿斤到八千亿斤，这是否靠得住？我看七千五百亿斤翻了一番，那就了不起。”

1959年11月25日，毛泽东还发表了《一个教训》的讲话，批判了高指标对于干部、群众的压力：

“千钧重担压下去，县、乡干部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干，少干一点就被叫做‘右倾’，把人们的心思引到片面性上去了，顾了生产，忘了生活。解决办法：（一）任务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过群众精力负担的可能性，要为群众留点余地；（二）生产、生活同时抓，两条腿走路，不要片面性。”

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毛泽东在郑州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

“对干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我们没有采取无偿剥夺的办法，而是实行赎买政策。……我们采取赎买政策，就使我们在政治上获得主动，经济上也有利。同志们，我们对干剥削阶级的政策尚且是如此，那么，我们对干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又怎么可以无偿占有呢？”“公社是1958年秋成立的，刮起一股共产风……一是穷富拉平（已纠正，还有余波）。二是积累太多。三是猪、鸡、鸭（有的部分，有的全部）无偿归社，还有部分桌、椅、板凳、刀、锅、碗、筷等无偿归公共食堂，还有大部分自留地归公社（有些是正当的归公社）……这样一来，共产风就刮遍全国，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这是不允许的。”

1959年4月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最高国务院会议：

去年的大跃进，伟大胜利，也确是真的。报纸上吹的那些东西，不能全信，我是不信的。什么几万斤一亩，哪有那个事？那是并拢来的，禾秧要熟的时候，把许多亩并到一亩。这些浮夸现象要破除，要搞老实的。

1959年4月29日发表了《党内通信：致六级干部的公开信》，其中提到了包产、密植、节约粮食、播种面积、机械化、讲真话这六件事，体现了对于中国农业问题的深切理解与担忧。文中特别提出不要听从上级关于指标、密植、浮夸的命令。关于具体的内容大家可自行翻阅毛选。

据传，毛泽东曾要求自己最信任的秘书田家英与逢先知、李学谦等人去四川省亲自种试验田，看看能打多少粮食。然而2017年逢先知先生发表的[文章](#)中，否认了种试验田的说法，但同时表明，当时的确是去调查农村问题，整顿人民公社，遏制‘共产风’、‘浮夸风’为特征的‘左’倾错误的。这部分记忆与李学谦的材料一致。

*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这一时期这有一些针对毛泽东的美化传言，比如在三年困难期间毛泽东不吃肉，依据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的《毛泽东生活档案》及汪东兴主编的《毛泽东遗物事典》，也属于不实信息。

六、共产风、浮夸风的恶果

从前文可以看出，自1958年起，大范围的共产风、浮夸风就已经刮起。这直接影响到59、60年的粮食收成。

但是这里有一个时间断点，就是实际上这一次全面位的纠正“左”倾错误在1961年时才开始。但毛泽东在1959年4月的《党内通信》上已经公开提出了问题，为何1959年下半年、1960年都没有得到重视，以至于自然灾害一直在持续，直到1961年才开始在中央达成统一？

关于这个问题，个人认为，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在于毛泽东实质上直到《党内通信》发表时，依旧考虑到自己培养的接班人的在党内和国内的威信问题，公开的纠责不利于党内的团结。

这就不得不提到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在江西庐山召开的庐山会议，此次会议与8月2日至16日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统称为庐山会议。关于庐山会议，目前没有详实的公开史料。会议的原定目标是纠左，即纠正大跃进过程中的浮夸风、共产风，然而发展到最后却成为了反右的会议。其中详情不得而知，但在毛泽东曾经的卫士长李银桥在《走下神坛的毛泽东》提供了一些关键信息：

.....回到住处，毛泽东本是吩咐我们收拾东西，准备散会走人。可是有些领导同志不干了，提议解决彭德怀的问题毛当天晚上，我便正式得知不下山了，召开中央全会，讨论形势变成了讨论彭德怀问题。

关于这次会议的情形比较复杂，会议上还“打倒了”彭、黄、张、周结成了“军事俱乐部”性质的反党集团。会议最终免去彭德怀国防部长和军委副主席职务。笔者在《刘少奇年谱》中发现了一些关键信息：

8月17日出席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会议研究了人事安排问题。刘少奇在会上作了题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问题和所谓“个人崇拜”问题》的报告，批判彭德怀的“错误”。

但关于这篇具体的报告，目前还无法查询到具体的信息。此外，会议结束后，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在1959年8月24日《在第十七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纪要》：

今年的指标很快就会看到作得到或是作不到。一到年底，作到了他就不怀疑了。能够超过一点就更好。所以，这个地方就有一个反“左”反右的问题。现在提出鼓干劲、反右倾，是否还应该反“左”呢？现在不提反“左”，恰当不恰当？是否反“左”反右都提，又反“左”，又反右？或者只反“左”，不反右？或者只反右，不反“左”？这个也是值得讨论的问题。有人讲这个话：为什么只反右，不反“左”？原来去年指标核实的过程就是一个反“左”的过程。反了“左”才核实了的；不反“左”就核实不了。去年不是有一些虚报浮夸吗？由于反对了虚报浮夸，才核实了；不反虚报浮夸，就核不了实.....从今年六月到七月这个时期，我们在庐山发出反右倾社论指示以前，已经有两个月，气就有点泄了，所以这个右倾现象已经冒出来了。就在落实的过程中、算账的过程中有些人就泄气了。这一阵风下来不得了，不是几个人的问题，而是几千万人、几万万人的问题.....我们看到了有这个现象，一方面那些主观主义的过“左”的现象已经纠正，一方面右倾现象已经冒头，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反右倾、鼓干劲，而不同时提出反“左”。因为反“左”已经反过几个月了。

可以发现此次会议实际上“左”的错误没有得到纠正，反而导致了错误的延续——倘若这一时期的左倾错误得以纠正，也就不会有“三年困难时期”了。

毛泽东后来之所以改变想法，可能主要是因为自1959年春、夏开始，大跃进的恶果开始陆续呈现，好几个省份出现了大面积的粮荒，如四川、安徽、山东、河南、甘肃等。相信这些地方的老乡对于父辈们口口相传的故事应该很清楚了。人民付出的惨痛代价，使得毛泽东终于痛定思痛，开始竭尽全力，全力纠正党内的严重“左”倾错误。

后续：1961年1月13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这些年来，我们的同志调查研究工作不做了。要是不做调查研究工作，只凭想象和估计办事，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所以，请同志们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第二天，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毛泽东向全党发出了“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要求1961年成为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

七、浮夸风、共产风为什么会导致缺粮？

“浮夸风”、“共产风”导致后来部分省份出现了缺粮现象，以致于到了60年10月份左右，部分地区的灾情开始进入中央的视野中。关于这方面的细节，之后有机会再开一文。这里主要阐述一下“共产风”及“浮夸风”为何会导致部分地区缺粮。

“共产风”其实导致的是物资浪费的问题，依彭德怀年谱：

谈到公社食堂，周小舟告诉彭德怀，公社食堂没有给群众带来什么方便，反而造成人力物力的很大浪费。

再联系上面提到的徐水县的案例，显然，当时的物资供应、生产力发展水平，还远远不足以支撑“共产式”的生活。但这个问题不是导致缺粮的直接原因，仅仅是造成部分地区物资紧缺。

“浮夸风”其实是导致缺粮问题的主要原因。因为新中国成立后，从全国范围来看，作为民生之本的粮食其实是不缺的，无非是吃多吃少的问题。最后能够上达天听，惊动中央，其实是“浮夸风”与当时的统销统购制度结合的产物。

据1953年《政务院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

.....农民在缴纳公粮和计划收购粮以外的余粮，可以自由存储和自由使用，可以继续售给国家粮食部门或合作社，或在国家设立的粮食市场进行交易，并可在农村间进行少量的互通有无的交易。

注意农民在“缴纳公粮和计划收购粮以外”才有“余粮”，当浮夸风吹起来之后，各地干部虚报了产量。当按比例缴纳粮食时，直接导致需要缴纳的粮食多出来好几倍，这就导致老老实实最拥护国家、按比例交了粮的农民反而只剩下极少的粮食、甚至没有了粮食。

据毛泽东年谱：

安丘县一个公社调走一个大队七十头母猪，不给钱，严重影响了社员生产积极性。沾化县有几个公社水肿病较多，全县春节后因水肿病死亡五百人，缺粮原因是卖了过头粮。

但其实就全国范围而言，尽管部分地区由于工农业比例失调和瞎指挥导致了粮食产量下降，但总体而言是不缺粮的，无非就是需要全国统一性的进行粮食挑拨而已，只要及时上报中央，其实不足以造成严重的后果。

然而，“浮夸风”的盛行，已经完全无视了党要求“一切从实际出发”和“实事求是”的原则。那么造成恶劣后果的部分地区官员，又怎肯乖乖及时上报实情呢？

究其原因，“浮夸风”也不是直接原因，没有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缺乏党性和严重官僚主义，才是造成灾害的根本原因。

八、历史的启示

综上，我们可以基本得出三年困难时期的主要几个人为因素：

- 1.领导干部缺乏基层经验，对于农业生产完全不熟悉；
- 2.基层官僚主义严重，罔顾人民群众生命健康与安全；
- 3.生产上盲目追求高指标，严重脱离生产力发展阶段；

我们现在经常挂在嘴边的领导干部要有基层经验，都是党和人民用血泪换来的历史教训。

参考文献：

《巨人的背影》

《毛泽东选集》

《毛泽东文集》

《毛泽东全集》

《人民日报》合订本

《刘少奇年谱》

《邓小平年谱》

《彭德怀全传》